

论当代大学的性质和功能

——与展立新、陈学飞教授商榷

杨德广*

摘要: 2013年,展立新、陈学飞教授提出“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是认知理性”“高等教育机构实质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并且否定高等教育“适应论”。本文认为这值得再商榷,并详细阐述了当代高等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包括大学的人民性、教育性、学术性、批判性以及大学的教学和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功能。

关键词: 潘懋元 适应论 大学性质 大学功能 认知理性

2013年,展立新副教授和陈学飞教授撰文《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以下称“理文”),在否定关于高等教育“两个规律”的理论、否定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同时,提出要“回归认知理性”,认为“高等教育本质上是发展认知理性的事业”“高等教育追求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认知理性的发展”。笔者对“理文”的这些观点不敢苟同,于是撰文商榷《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历史的误区吗?》。笔者从六方面剖析了“理文”否定“适应论”的错误之处,并从四方面——高等学校功能的演变和发展、教育本质问题的争论、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视角、国家教育方针的视角,论证了高等教育的“适应论”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历史的误区。同时,阐述了潘懋元关于“两个规律论”和“适应论”的内涵。不久,展立新、陈学飞教授以《哲学的视角: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四重误读和误构——兼答杨德广“商榷文”》(以下称“哲文”)一文做出回应。“哲文”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涂尔干、舒尔茨等人的观点,进一步否定高等教育“适应论”,但没有提及“发展认知理性”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和“追求的核心目标”,而是又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学术共同体,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实质上是

* 杨德广,男,江苏南京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个学术共同体”^[1]，“本文更愿意用学术共同体精神一词来概括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及科学精神”^[2]、“因此，建设健全学术共同体精神”、“更是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长盛不衰的根本保障”^[3]。

读完“哲文”，笔者感到仍有必要与展立新、陈学飞教授再商榷。学术共同体是 20 世纪英国哲学家布朗依在《科学的自论》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他把全社会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社会群体，以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这样一个群体被称为“学术共同体”，仅是从事科研工作同行者的组合。在这一观点支撑下，“哲文”鲜明地提出“高等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基本关系并不是‘适应’与‘被适应’的关系，而是批判反思主体和批判反思对象的关系”^[4]，因此，“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不是迎合政治权力和‘当权者’的需要，而是要自觉把政策、权力、当权者等都当作批判反思的对象”^[5]。笔者不禁要问：难道大学的性质仅仅是“学术共同体”吗？大学教师中虽然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但更多是从事教学工作的，那么是否也应该有“教学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呢？大学的功能和“核心任务”仅仅是对“政策、权力、当权者”的批判反思吗？大学就没有其他功能吗？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狭隘、片面和简单化。近代高等教育自中世纪产生以来，已有 800 多年历史，从刚开始的行会组织、象牙塔教育逐渐发展为培育人才、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的主力军，大学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计民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日大学的社会功能已经多样化，它们既是政治组织，也是经济组织；既是社会组织，也是文化组织”。^[6]

本文着重探讨当代大学的性质和功能是什么，进一步与“理文”和“哲文”的作者商榷和切磋。笔者于 2001 年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过《试论现代大学的性质和功能》（以下简称“试文”），拜读了“哲文”以后，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我认为，探讨当代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尤其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戒脱离实际，搞抽象的经院式的研究方法。

关于大学的性质，本文着重从人民性、教育性、学术性、批判性四方面加以论述；关于大学的功能，着重从教学育人的功能、科学研究的功能、服务社会的功能、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四方面进行论述。

一 关于大学的性质

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时期，大学具有不同的性质，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大学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是行会组织，19 世纪欧洲的近代大学是“自由人共同体”“学者之家”，20 世纪世界各国的大学成为“生产知识的工厂”。到了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随着大学地位的提高，大学作用日益凸显，由于社会的复杂

性、多元化，大学的性质也越来越多元化，并非“学术共同体”一句话所能概括。当代大学的性质包括人民性、教育性、学术性、批判性以及创新性、综合性、社会性、服务性、自主性、开放性、国际性等。本文仅对前四个属性进行阐述，后几个属性已在2001年《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试文”中论述过，不再赘言。

1. 大学的人民性

在以前的教育论著中不太提“人民性”，而提“阶级性”。教育的阶级性是指教育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并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由于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掌握政权的国家，而不是剥削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因此阶级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正如中国共产党原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现在“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的人民性，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样，大学的人民性，就是体现在大学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服务，因而提人民性更为确切，不宜再提阶级性，以免产生阶级斗争之嫌。然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学要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本文之所以提出人民性或阶级性，是针对“哲文”否定高等教育具有上层建筑属性而言。“哲文”说“高等教育既不是上层建筑，又不是经济基础，而是一种社会中介活动”^[7]，否定了教育的人民性（阶级性），这正是“哲文”作者否定高等教育“适应论”的理论依据。

关于高等教育属性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我国著名教育家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一书中首次提出“教育是上层建筑”。苏联教育界在20世纪50年代认定“教育具有上层建筑的特点”。受其影响，我国一直把教育当作“上层建筑”，属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风暴中，教育尤其是大学首当其冲，成为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前沿阵地，深受其害。“文革”以后，尤其是强调“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人们对教育的本质展开了热烈讨论，大致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生产力，因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已间接或直接参与了物质生产过程，成为现代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如果把教育视为上层建筑，那么其在阶级斗争中又要成为“革命”对象，遭到冲击。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上层建筑，因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教育思想、理论、方法、路线等，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代表一定阶级的意识和利益，教育没有参加生产，与生产力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否认教育是上层建筑，便是否认教育的阶级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部分属于上层建筑，部分属于生产力：教育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等属于上层建筑；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可以把科学技术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高等教育可以直接为社会、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因此具有生产力属性。第四种观点认为，教育既不属于上层建筑，又不属于生产力，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多数人赞同第三种观点，

笔者亦然,即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有上层建筑属性,又有生产力属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自从有阶级以来,教育就有阶级性,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把教育作为加强其统治、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教育都是根据统治阶级及社会需求培养人才的,教育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因此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如果教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不能适应统治阶级和当权者的需求,教育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教育总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这就是教育的阶级性。我国是人民掌握政权,教育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教育的人民性。20 世纪初,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否定教育的阶级性,否定教育的属性,受到列宁严厉批评“你们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借以进行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列宁尖锐地指出“学校可以摆脱生活,可以摆脱政治,这是撒谎骗人。”^[8]由此可见,举办教育的学校包括大学不可能成为超阶级的乐园和净土。“哲文”提出“高等教育不要适应社会和‘当权者’的需要,高等教育不是上层建筑,而是中介活动”^[9]正是否定教育的阶级性,早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哲文”还提出“当高等教育的基本性质从‘上层建筑’转变为‘生产力’的时候,‘适应论’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10]然而,现实社会不存在上层建筑转变为生产力,这是两个不同的属性,而高等教育具有两重属性。“哲文”完全否定高等教育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是与“适应论”观点的根本分歧所在;也是“理文”提出的“高等教育不必去适应任何一种外部对象”的原因,这显然包括不必适应社会需求和人民需求,高等教育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认知理性”服务。这种否认教育的阶级性、超阶级性的教育是不存在的。教育总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我国的教育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教育的阶级性(人民性)。

鲁迅曾经对文学的阶级性作了很形象的描述,他说“给淌着香汗的小姐”看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歌颂“淌着臭汗的工人”的文学是无产阶级的。推而广之,那么教育的阶级性体现在教育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教育只有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由此,教育的适应性,大学的适应性,是人民性的最起码的体现,主张教育无须适应社会发展,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是脱离客观现实的。

2. 大学的教育性

教育性是大学的第一属性。大学是什么?大学是教育和科研的中心。大学有什么?大学有大师、有大业、有大典、有大雅,更重要的是有大学生。大学的教育性主要体现在对大学生传授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等方面。本文将从“大教育”的视角论述大学的教育性。什么是教育?简而言之,就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给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育的一种社会活动,其中把德育放在首位。这在古今中外早就有之。如我国古代教育总把学道、传道放在教育的首位。两千多年前的西周,就提出“乡三物”,即用“德、行、艺”教育万民,便是把德育放在首位。孔子在教育弟子时始终

把德育放在首位。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的教学内容称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和乐，实际上是德育。中国古训：“不学礼，无以立”，礼即道理、伦理。教学的教育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外也是如此，如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德育先于智育。”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说“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他强调“教学的教育性”就是说学校不能仅传授知识，更要重视育人，要加强道德教育。英国教育家洛克说“我认为一个人或一个绅士的各种品性中，德行是第一位的，是最不可缺少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说“教育主要是培养儿童的德行”。^[11]我国的教育强调“立德树人”，强调“全面发展”，并非是“迎合政治权力和当权者的需要”，也没有违背教育规律，这正是潘懋元教授提出的内部规律。

近些年来，我国以“分数为目标”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的教育性受到严重挑战，逐步退化：把教育变成教学，教学变成教书，教书变成传授知识，传授知识变成以分数来衡量优劣好差，把教育教学退化为追求分数，把大教育变成了小教育，把全面发展教育变成了单一的智育。教育性的缺失，导致部分青少年学生道德品质不好，人文素养不高，学习动力不足，违纪违法现象呈上升趋势。强化大学的教育性必须树立大教育观，树立“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这是学校的一切工作出发点和立足点。让教育回归教育，应把德智体美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把思想品德教育、育人教育放在第一位，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哲文”不认同社会主义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说“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属于一种理想化的价值追求”。“哲文”的作者不仅否定了教育的教育性，而且否定了教育方针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办学育人的目标、方向，必须坚持，不能因为有些学生不可能全面发展而否定教育方针，视为“理想化”。

3. 大学的学术性

学术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体现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始于中世纪的近代大学主要是传授知识。1810年，德国洪堡创立柏林大学，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增强了大学学术性的内涵。20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大学学术性基础。美国典型的研究型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位校长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 Gilman）认为“大学的目标是最自由地促进有益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和提高学者水平”^[12]。霍普金斯大学之所以能飞速发展，成为美国顶尖级大学并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与这种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和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的理念密切相关。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919年的开学典礼上强调指出“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13]蔡元培倡导的北大校训“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进一步体现了大学的学术性，学术性是一流大学的本

质属性。美国密歇根大学前校长杜德斯达 (J. J. Duderstadt) 说 “大学最基本的功能, 仍然是学术活动 (主要指的是一流研究型大学)。”^[14] 在精英教育阶段, 大学很少, 主要是学术型、研究型大学。到了大众教育阶段, 大多数大学是教学型的, 主要培养应用、技能类人才, 小部分研究型大学以科学研究为主, 把学术性放在第一位, 是 “学术共同体”。因而不可一概而论, 应区别对待。

如何把握好大学的学术性? 一是大学要成为探究高深学问的基地。大学不能仅传承知识, 还要创造新知识, 这就必须加强研究。大学在学术上要勇于探索, 执着追求。二是要创造良好的学术自由氛围, 允许各种学术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鼓励教师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三是教师和学生都要参加研究工作。大学教师要教好书, 提高教学质量, 就必须重视研究工作, 把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大学教师要成为学问家, 就不能仅当 “教书匠”, 应承担教学、研究双重任务。教师还应积极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科学研究, 在全校形成浓厚的研究氛围、学术氛围。四是不同类型的大学, 学术性的程度不同。不能要求所有大学都是学术型大学。大多数是教学型、应用技术型大学, 以教学、培养学生技能为主, 这类大学要瞄准市场需求, 以岗位能力为目标, 而不是 “学术共同体”。五是把握好学术性和功利性的关系。功利即 “功效和利益”。大学既要讲学术性, 又要讲功利性, 不要顾此失彼。不同类型的大学在学术性和功利性方面侧重有所不同。作为少数研究型的重点大学更多地强调学术性, 兼顾功利性; 而大多数一般高校、应用型的大学, 更多地强调功利性, 兼顾学术性。我们这里讲的功利性, 并非指个人功利、小团体功利, 而是社会功利, 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功利。

“哲文” 所提出的 “大学是学术共同体”, 发扬 “学术共同体精神”, 在少数研究型大学是适用的, 但并不适用于大多数高校。我国现有普通高校 2400 多所, 其中真正属于研究型大学 (即 985 工程大学) 的还不到 40 所, 包括 211 工程大学在内也仅百余所。另有 700 多所新建本科高校, 属教学型大学, 主要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 有 1300 多所高职高专院校属职业技能型大学, 主要培养技能型专门人才。在研究型大学, 广大教师都要从事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包括基础学科的研究, 正如 “哲文” 中说的 “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都是学术共同体成员, 都享有一定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权利。”^[15] 这类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 研究未知科学, 必须有高度的自主权、自由度, 不受社会和政府的约束和干扰。即使是研究型大学, 也要坚持 “以本为本”, 抓好本科教育, 也要培养应用型人才, 向创业型方向发展, 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搞学术。其他大多数高校是应用型的、职业技能型的。虽然学校及教师也要开展科学研究, 但主要任务不是高深学问的研究和基础性研究, 而是开发和应用科学技术研究, 主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培育技能。如果说研究型大学是探索事物的 “为什么”, 那么应用型大学主要探索事物 “是什么”, 职业技能型大学主要解决 “怎样做”。对占高校一半以上的职业技能型大学来说, 并非强调学术性, 而是强调实践性、技能性, 强调学生

的职业意识、职业素养、职业能力。因此，大多数高校不宜纳入“学术共同体”范畴，不能与研究型、学术型大学混为一谈。它们叫“知识共同体”更为恰当。

总之，不应把学术性、学术共同体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哲文”说学术共同体成员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学术共同体精神“可以发挥任何政策法规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建立健全学术共同体精神，更是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长盛不衰的根本保障”。这显然是过度夸大了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性能，把仅适应于少数研究型大学的性能强加到所有大学身上，是不适当的，也是做不到的，是脱离现实的主观臆想。“哲文”的错误还在于以为社会不需要学术，不懂学术，只有少数高高在上的教授关起门来搞学术，从而把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对立起来。

4. 大学的批判性

批判性是大学区别于其他部门的特殊性能。批判就是对已有东西的重新判断和评论。批判就是创新，“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一个‘新世界’”^[16]。西方学者认为“大学是从事社会批判的中心，批判是大学的本质，是判断大学与非大学的分水岭”，“大学批判精神是促进人类觉醒，激励人类创新进取，推动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实现远大理想目标的重要保证，是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从必然提升至自由的必由之路”。^[17]大学的批判性是由大学的功能决定的。

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必须有批判性。数千年来人类创造和积累的知识浩瀚无垠、无穷无尽，大学要批判地吸收，取其精髓，弃其糟粕，将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大学要培养学生有批判性思维，其将来才能有批判精神、创新能力。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开展科学研究、创造知识的基地，必须有批判性。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新事物，就是创新，但首先要批判旧事物，批判陈旧的、过时的知识，才能创造新知识。没有批判就没有科研成果，就没有创新。

大学是服务社会的服务站，大学要用自身的智力优势为社会服务，包括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两个方面，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但大学为社会服务与企业、工厂等其他部门不一样，还应担当批评社会、揭露社会时弊，成为观察社会的望远镜，指引社会的灯塔，引领社会的前进。大学的批判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但是“大学的批判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18]“重点大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就是弘扬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和倡导的精神，批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陈腐观念”。^[19]

当今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西方文化对我国冲击越来越大。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消极影响，以及体制、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等，导致社会上腐败现象衍生，一部分人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等盛行。作为最高学府的大学应担当起批判社会的重任，勇于面对现实，揭发和批判社会上一切腐败的、丑陋的东西。美国著名教育家赫钦斯指出：“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社会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隐没

于社会环境之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责任。”^[20]

由上所述，大学在社会服务中应义不容辞地承担社会批判的责任。从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看，批判性远不如外国的高校，这是有客观原因的。欧洲中世纪诞生的大学是在与反动没落的教会斗争中产生的，一开始就有鲜明的批判性。工业革命后诞生的西方大学，是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诞生的，许多高校是自筹经费的私立大学，与政府关系不太紧密，大学的独立性和批判功能较强。而中国的高等学校，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大学以及改造后的大学，绝大多数是公立大学，是根据国家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建立起来的，教育经费由政府掌控，大学必须按国家和社会需求办学，大学基本上与政府和社会保持一致。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五六十年代“左”的思想影响，削弱了大学的批判性。我国大学的批判性还发挥得很不够，应大大加强。但我国大学的批判性表现形式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我国每一个重大的法规、政策、项目，以及每次党代会、人大、政协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听取全国各方意见，尤其注意听取大学的意见。可见，大学行使了批判性功能，大学的批判性并非体现在法规、政策颁布之后，而是之前。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大学的批判性是建立在维护人民政权、人民利益基础上，而不是放在对立面的。大学的批判性“并不意味着大学与社会对立，批判的目的在于改善和建设”。^[21]

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的政体性质，决定了阶级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当权者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办大学既是当权者的需要，也是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大学应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不应该把我国社会主义大学放在与中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大学同一个平台上来审视。因此“哲文”提出的“高等教育核心任务不是迎合政治权利和当权者的需要，而要自觉地把政策、权利、当权者等都当作批判反思的对象”是不妥当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应理直气壮地说“大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二 关于大学的功能

“哲文”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认为知识只有‘适应’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的功能”，^[22]以此来佐证他的“高等教育无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几百年的教育发展史，清晰地印证了大学功能的演变正是不断适应时代和社会变迁的结果。中世纪大学主要为教会服务，培养神学、医学、法律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到了 19 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教会势力的削弱，德国的洪堡指出教育不是教会的附属，大学必须追求知识和真理，实现大学教学与科学研究的统一。英国教育家纽曼不认同洪堡的学术研究是大学的社会功能，他认为大学的功能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高尚情操和强烈责任感的“自由人”。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提出大学的功能是“为社会服务”。从德国古典大学以“学科”为中心，到英国古典大学以“学生”为中心，到美国现代大学以“社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反映了大学功

能在伴随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社会的嬗变，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的，而并非像“哲文”说的高等教育与社会不存在“适应”与“不适应”的关系。

现代大学的功能是什么？全世界普遍认为是三大功能，即教学和育人、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近年来我国又加了一条“文化传承与创新”。笔者认同大学的四个功能，大学功能的变化发展，反映了大学不断与社会发展适应的过程。

1. 大学的教学和育人功能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教学。在学校教育活动中，大部分时间是教学活动，通过教学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因此教学和育人是大学的主要功能。然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及标准不尽相同。比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各有自己培养人才的标准。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培养拥护自身利益的人才。即使在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培养人才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比如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则要求学生必须听话，有较系统的专业知识，适应行业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则要求学生必须有开拓精神、竞争能力，有复合型知识，适应市场的需要。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是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是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完整的、坚实的思维定势和教学体系。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教学观念上，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知识为本，主要立足于向学生灌输一定的知识量，而不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学生的接受程度，忽视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二是在教学模式上，搞统一的、刚性的教学计划，同一专业的学生用一种模式培养，不考虑学生的差异和个性特点，每个学生学同样的课程，同样的进度，同时毕业。三是在教学内容上，以专业为中心，以行业为目标，知识结构单一，人文教育薄弱，教学内容老化，学生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内容和组建知识结构。四是在教学方法上，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学生听，“满堂灌，注入式”，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没有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发展学生的个性。五是在考试方法上，主要引导学生死记硬背，以考试分数确定学生的优劣，束缚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这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不少学校忽视了学生思想、心理素质的提高，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忽视了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忽视了隐性的、对学生全面发展起潜移默化作用的育人环境建设。我国高校在教学上存在的这些问题，是长期以来旧的传统教育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为了适应国际人才竞争的需要，适应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积极探索和树立新的教育观念、教学观点，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在新形势下，发挥大学教学和育人的功能，并取得一定效果。一是在教学目的上，树立以人为本，而不是立足于以知识为本，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二是在教学内容上，变刚性的教学计划为弹性的教学计划，更新陈旧的教学内容，优化课程体系，打破学科课程之间的壁垒，让学生有选择学习内容、自我组建

知识结构的机会,让学生有一定的自学时间,有发展个人兴趣爱好和能力的机会。三是在教学模式上,把统一要求与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结合起来,承认学生的差异,实行多种模式分流发展,让学生按自己的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培养模式。四是在教学方法上,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让学生独立获取知识。五是在考试方法上,不仅考记忆性、认知性知识,而且考综合性、分析性、理解性、创造性的知识。

现代大学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教书先教人,育才先育人,大学要把立德树人放在首要地位,只有培养学生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努力学习,不断进取,增强学习动力。我国的教育方针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各类教育和学校必须贯彻执行的,这绝不是“对国家权利的屈服”,也不是“一味地要求高等教育被动的适应国家权力”。^[23]大学的育人功能是由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决定的。赫尔巴特指出的“教学的教育性”,强调的就是德育和育人。西方国家针对 20 世纪的教育忽视了德育,导致“人不见了”的现状,指出 21 世纪的教育必须加强德育,“找回失去的人”。美国学者指出“如果美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应该把儿童教育成有仁义之心和关心他人的人。”他们强调“集体主义、合作精神、奉献精神和责任感,道德的核心是责任感”。日本对学生的要求是“有良好的教养和出色的人品,要对学生进行崇高的理想、社会公德、丰富的个性等道德教育,不要只偏重知识的教育。”^[24]

大学如何加强立德树人教育?一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尤其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二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三是以道德规范教育为基础,培养学生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人文素养、法制观念;四是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成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

大学的教学和育人功能,还要体现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我国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方针,又提出到 2020 年建设成自主创新型国家。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大学必须成为创新型大学,必须培养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才。大学要实施拔尖创新人才计划,重点大学应更多地承担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任务,从国家教育部到大学都要有具体部署。笔者于 2001 年 6 月在文汇报撰文,对大学如何为创新型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出了 4 条建议,其中包括:重点大学既要出成果,又要出人才;要制订“出人才”计划;要在经费、设备、时间等方面给予保证;要依靠“名师”“大师”直接培养尖子学生,对尖子学生在本科时就要配备导师。“哲文”不仅不认同,而且还武断地说“实践证明,类似的人才培养计划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25]据我所知,北京大学于 2007 年建立的“元培学院”就是立足于“培养拔尖人才”的新模式,全校选出了 34 位“名师”担任本科生中尖子学生的导师,并制订培养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我认为重点大

学要充分认识到教学和育人的功能，并努力付诸实践。总之，我们应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大学在育人方面采取的一切积极举措，而不应采取“泼冷水”和虚无主义的态度，才能在育人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

2. 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

中世纪的大学几乎是与社会、经济相隔绝的“象牙塔”，主要向学生传授知识。“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不从事任何研究，而且与专业或职业教育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有学科都属于基本文化修养，如科学、哲学和艺术等学科。”^[26]

在“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科学诞生的推动下，1810年，德国新人文主义者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打破了大学仅局限于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唯一职能，倡导培养人才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洪堡强调科学研究是教授的正式职责、第一位职责。他认为，教师应该为发展而教。每个教师都有义务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每个学生都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到实验室或研究所参加一定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洪堡的教学、研究与学习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柏林大学突破了传统大学的模式，成为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推动德国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从此，科学研究成为公认的大学第二职能。

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都承担了科学研究的功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高校科研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是高水平教师成长的重要条件，是学科发展和新学科产生的基地。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类型主要有3种：①基础研究。主要探索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即寻找“为什么”的答案。基础研究十分艰苦，要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保障，要有稳定的环境，不能急功近利。基础研究一旦获得突破和成功，就会对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②应用研究，即使用基础研究的理论直接解决当前社会、生产、临床等具体实际问题，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针对性。③发展研究，即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进一步扩大，转化为生产力和物质成果。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原则有以下4点。①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必须把教学工作放在第一位，教师要兼顾教学和科研，把科研成果应用到教学之中，应用到高级人才培养之中。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发展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每所高校都要统筹安排这三方面的科研项目，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应有所侧重。研究型大学应多承担基础研究，其他高校多承担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但每所高校都要直接承担有关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国计民生的科研课题、科技开发、重大项目的攻关，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③面向国内外学术前沿与面向国家需求相结合的原则。这两方面都不可缺少。占领学术前沿就是占领科学技术高地，但科研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大学应把主要精力用到国家需求和社会需求方面。从整体而

言,研究型大学可以在基础研究、面向国内外学术前沿、科技前沿方面多投入一些精力,但也要加强推广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他高校多承担直接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课题,但也要抽出一部分力量从事基础性、前沿性研究。④自由探索与组织重大科研项目相结合的原则。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有一批高水平的、创新能力强的科研队伍,应放手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专长自由探索、自由研究,学校给予支持、扶持,为他们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高等学校有高水平的设施、先进的国家级或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应主动承担国家或省部级重大课题,组织科研力量开展攻关,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教育教学规划基金、国家重大科研计划以及省市级相关的科研项目、攻关项目。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的智力优势、科研优势,促进学校科研水平的提高,促进科研队伍的成长;另一方面可以对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扩大学校的影响力。

科学研究的功能对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特点,应因校而异,因地制宜,不要互相攀比。研究型大学应多承担一些科研任务,因为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六大优势: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的基础性、设施的先进性、资源的丰富性、人才的高端性和组织的高效性。研究型大学已成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主力军,是科学研究的主阵地,是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力量。其他教学型、职业技能型高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教学、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但学校也必须组织科研任务,教师也必须参加一定的科研和科技开发工作。不从事科研的教师不可能提高教学质量。“哲文”批评“适应论”总是片面强调经济、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制约作用,“而严重地低估了高等教育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促进作用”。恰恰相反,正因为“适应论”者高度认识到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才坚持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必须主动为社会发展服务。而“哲文”却一再强调把社会各个方面作为高等教育“批判反思的对象”。如果像“哲文”所说的高等教育不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高校科研就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是没有生命力的。

3. 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

大学的第三功能:服务社会的功能。这是 21 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来的。1862 年,美国颁布《莫里尔法案》即土地赠予大学法,使各洲把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农业方面建立了“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制度,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对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起了重大作用。威斯康辛大学坚信大学必须与社会紧密结合,主动为社会发展服务,自己也能得到迅速发展。该校校长查理斯·范海斯说“大学必须为社会或社区服务,服务应该成为大学的唯一理想。”这一理念和实践在美国广泛推广,有力地推进了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推进了美国高新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大学从一个功能发展到两个功能,再发展到三个功能,这就是主动适应社会的必然结果。因此,并非像“哲文”

所说“高等教育‘适应论’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社会需求角度阐述和论证高等教育问题的理论”，^[27]事实上，“适应论”适合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

高等学校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应建立教育产业、发展教育市场。这是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必由之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高等教育也全部纳入国家计划之内，成为由国家包下来的事业单位。大学作为国家办学机构，为国家培养干部，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培养人才。而在市场经济下，国家不再对高等学校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高等学校不仅要为国家和全民所有制单位培养人才，而且要为社会各方面培养人才，办学经费由国家、社会、学生（家长）等多渠道集资。高等学校还必须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教育产业，建立教育市场，提高办学效益，扩大经费来源，以弥补国家对办学经费投入的不足。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高等学校是生产知识的产业、生产科学技术的产业、生产信息的产业、生产人力资本的产业，与此相应可建立知识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人才市场。发展教育产业、建立教育市场，可以发挥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最大效益。①社会各方面及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到教育市场上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高等学校部门所有制，改变一所学校只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服务的狭隘观念，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大大提高办学效益，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有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②建立教育市场后，可以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教育成果，教育的价值可得到更广泛的体现，学校的功能和作用可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提高了教育的地位，调动了大学办学的积极性。在计划经济下，教育的主要成果——大学毕业生，是由国家统包统配的，只为少数部门服务，如今全部进入人才市场，满足了社会各方面及毕业生的需求，促进了大学按需求办学。③教育市场的建立打破了大学与社会的围墙，学校与社会直接联系，大学接受社会的选择、社会的监督，有助于大学更好地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更好地为社会服务。④教育市场的建立改变了大学的一切产品、成果全部由国家统一调配，不计算成本和价值的现状。如今大学成果已成为商品，进入了市场。学校可以将自己拥有的教育资源发展教育产业、教育市场，提高办学效益。

教育为社会服务，还体现为教育也是一个大的消费市场。教育事业发展了，必然会产生教育消费市场，即教育事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整个社会消费方面的需求市场。比如各地建立的大学城，有数以万计的学生、教职工聚集在大学城内，对衣、食、住、行的需求很大，对与教育、生活相关的需求很大，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教育市场大了，教育消费市场也大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大学间接为社会服务产生的效益。

发展教育事业，建立教育市场是为社会服务的重要途径，越来越显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必须因校而异，因地制宜，必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为此，必须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发展教育产业，是为了充分利用大学的教育资源，发挥市场调配大学教育资源的作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必须依法办学，合理

收费。发展教育产业，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减少教育投入，国家仍然是公办高校投资的主体，仍然要增加投入。二是各类高校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功能应有所不同。大学为社会服务不能雷同化，应从各高校的特点和社会需求出发。比如研究型大学应在培养高端人才、发展高科技方面发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国家应加大对研究型大学、重点大学的投入，让他们安心于研究高深学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一般普通高校应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发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高职高专院校应在大众化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方面，发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我国还应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高质量培训机构，以满足社会各方面及各类受教育者的需求。三是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都享有 9 年义务教育。但大学是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目前还不可能人人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大学的公益性应体现在入学机会均等以及非营利性等方面。大学的产业性与公益性并不矛盾。发展大学的产业性，有助于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教育资源，比如大学在各种各样的培训活动中，对人才培养发挥了很大作用，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学校收入增加了，增加了教育资源，更多人可以到大学学习，从而推进了教育的公益性。因此，教育的产业性与公益性是相辅相成的。大学的服务功能反映了大学适应性的特点，也是大学适应性的具体体现。如果按“哲文”所说的大学不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那么大学的服务性功能则不复存在。

4. 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

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大学的三大功能。2011 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大学“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这被我国学界公认为是大学的“第四大功能”。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是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源泉。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每个国家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沉淀、凝聚、积累了大量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传承其中的优秀成果。优秀的文化成果可以展示一个国家光辉灿烂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优秀文化不仅要传承，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创新。创新是文化保持生机与活力的不竭动力。离开了创新，文化就难以延续传承，更不可能繁荣发展。作为最高学府的大学，是人才荟萃之地，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一是担当文化传承的任务。大学要把人类积累的丰富知识、科学文化、精神财富，尤其是优秀的中华文化整理出来，编写成教材传授给学生和后人。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二战以来，西方国家乘全球化之际，竭力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直接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大学要有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紧迫感，不能丢掉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一种有巨大能量的“软实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大学做好文化的传承工作，就是增

强国家软实力。

二是担当文化育人的任务。大学不仅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授给学生，而且要用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比如儒家“忠、孝、仁、爱”的礼教文化，中华民族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忠报国、先人后己”等人文精神，都是育人的好教材。努力培育当代大学生成为有高尚道德情操、人文素养，有高度责任感、事业心的人，激励一代代青年人奋勇前进。

三是担当文化引领的任务。大学不仅不能远离社会，“与社会保持张力”，而且要引领社会前进。大学是知识密集之地，大师荟萃之地。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源头，是社会文化和道德的捍卫者和提升者，是引领社会文化的先声。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经济市场化、行为功利化、利益多元化、价值观念模糊化的现实，大学要用传统的优秀文化、现代先进文化传播正能量，发挥大学先进文化辐射源和创新源的作用。大学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丰富资源和智力优势，用先进文化服务社会，引领社会前进。大学不应当以“学术共同体”自我封闭，应当紧密贴近社会，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创新。

四是担当起文化创新的任务。文化传承的最终目的是创新。党中央提出我国要在2020年建成“自主创新型国家”，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大学要首先担当起“文化创新”的重任，这是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如何落实大学文化创新？①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思考，教会学生创新，实施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努力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使其将来成为自主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②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积极鼓励教师和学生创新，允许试验，允许失败，把创新教育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作为考核教师、学生的重要内容之一。③鼓励双学科和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④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要积极扶持，另外制订培养计划，配备导师，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 小结

综上所述，“理文”提出的“高等教育本质上是发展认知理性的事业”，“哲文”提出的“高等教育机构实质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不是迎合政治权利和‘当权者’的需要，而是要自觉把政策、权利、当权者等都当作批判反思的对象”是不适合当今我国大学的性质和功能的。大学的性质和功能是多元化、多样性的，而大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当权者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权力”而言不存在“哲文”所说的“仆从”关系。“哲文”认为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是对“国家权力表示屈服”“是迎合政治权力和当权者的需要”，而应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强制性的物质力量”。这种把大学与当权者和政府放在对立面

的观点,在我国是完全不适当的,是一种错误导向。不能把中世纪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与当权者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生搬硬套到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几百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改变,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发生了更大的变化。“高等教育的适应性就表现在要能主动地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28]当今的大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反思”上,而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足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立足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才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核心任务。我国每次重大决策、重大举措出台前,都广泛征求意见,接受批评,尤其很重视听取大学的意见。大学完全可以自由地批评、批判存在的各种问题。党和政府非常欢迎所有正确的批评意见并吸纳改进。但在大政方针、法规、决策等颁布后,各个方面、全国上下都应认真贯彻执行,大学也不例外。不能一味地把政策和当权者当做“批判反思的对象”,大学必须与党和政府、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不能只当旁观者、批判者,不当建设者,更不能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潘懋元教授提出的高等教育适应论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客观现实的。大学如果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不主动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大学能生存吗?当权者以及社会需要这样的大学吗?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这样做。因此,研究问题要从客观现实出发,不要从理论到理论,为理论而理论。

参考文献

- [1] [2] [3] [4] [5] [7] [9] [10] [15] [22] [23] [25] [27] 展立新、陈学飞 《哲学的视角: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四重误读和误构——兼答杨德广“商榷”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4期,第154页;第170页;第171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6页;第165页;第154页;第160页;第158页;第167页;第150页。
- [6] 徐辉、李薇 《大学功能的世纪演变》,《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3期,第34页。
- [8] 《列宁全集》第28卷,第69页。
- [11] [24] 杨德广:《现代教育理念专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第30页;第31页。
- [12] 卢晓东 《联邦政府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5。
- [13]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4]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 《21世纪的大学》,刘彤、屈书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第58页。
- [17] [18] [19] 刘振天 《大学社会批判精神的源泉及当代境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3期,第61页;第65页;第65页。
- [21] 刘振天、杨雅文 《大学社会批判:知识、政治与道德》,《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第6页。
- [20] 张安哥、甘永涛 《西方大学理想的嬗变、模式、挑战与应答》,《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6] 奥尔特加、加塞特 《大学的使命》，徐小珊、陈军译，浙江出版社，2001，第 54 ~ 55 页。

[28] 王洪才 《论高等教育“适应论”及其超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 年第 4 期，第 134 页。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ies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Zhan Lixin and Professor Chen Xuefei

Yang Deguang

Abstract: In 2013 ,Professor ZHAN Lixin and Professor CHEN Xuefei proposed tha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s cognitive rationality” , “The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naturally an academic community” . Thus they denied the “adaptation theory”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 including the people , educational , academic and critical nature of universities , and pedagogy , talents cultivation , scientific research , social services ,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

Keywords: PAN Maoyuan , Adaptation theory , University nature , University function , Cognitive rationality

(责任编辑 郭华桥)